

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

伍 中

卷

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

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DANGDAI
ZHONGGUO
ZHEXUEJIA
WENK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11 下

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



任平 卷

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

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任平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
ISBN 978-7-303-09905-4

I. 创… II. 任…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中国 IV. 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6987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 子 信 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26

字 数：366 千字

印 数：1~3 000 册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策划编辑：饶 涛 责任编辑：饶 涛

美术编辑：高 霞 装帧设计：高 霞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走向出场学视域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代序)

欣文（以下简称“欣”）：任平教授，您是我国哲学界思想比较活跃和成果颇丰的中青年学者，我们经常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上拜读您的大作。前些年您在学界首先倡导的“交往实践观”研究，在《哲学研究》开辟专栏持续了一年多的讨论，《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等一系列著作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近年来您在首届“中国哲学大会”上及一系列论著中又倡导“出场学视域”，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我的问题首先是，作为一个富于理论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学者，您是怎样走上哲学道路的？

任平（以下简称“任”）：在青少年时期接受哲学启蒙纯属时代使然，但因此成为我一生的选择。我的父母属于那种“有文化”的军人。20世纪60年代，从部队转业后，父亲曾在一所苏北农科大专院校任党委书记，母亲则任马列主义理论教员。于是，除了马、恩、列、斯、毛的选集外，家里就有了几本后来被称之为“苏联哲学红色经典”之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

联科学院哲学所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还有一本厚厚的苏联版《哲学辞典》，艾思奇本和孙叔平本教科书一应俱全。在那个时代，其他的精神生活是极其贫乏、无从选择的，于是就剩下两极：一是火热的政治生活，另一就是哲学思考。哲学与生活，早年就在我的人格深处结缘，成为贯穿我一生的存在方式。翻阅这些哲学书籍极大地帮助我度过了艰难的“文革”岁月。即便在1972年底高中毕业后不久成为一名农场知青，几卷马列著作、两本康氏教科书、苏联版《哲学辞典》也随身相伴。劳作之余，青灯黄卷，虽苦犹甜。进入大学，我获得了系统学习哲学的机会，几乎翻遍了当时在学校图书馆能找到的所有中外哲学书籍，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所写的五十余本哲学笔记，约七百多万字。漫游于形上世界，与古今智贤对话，可以提升境界，通晓世道，益智养心。在我看来，哲学绝不是脱离生活、一劳永逸的僵死的知识集成，而是有生命历史的在场幽灵。一种哲学就是一种精神的历史存在方式，它不断进入历史生活的底蕴，有能力不断选择新的出场形态。如果说，我的青少年时代与哲学结缘多半出于无奈，那么，与同时代许多的学者一样，受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催化，从变革生活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观念，不断冲刷我内心的传统哲学底色，这一变革促使我自觉地走上哲学创新之路。

欣：任教授，您最先在国内学界倡导“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是否与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独树一帜的理解相关？

任：是的。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探索，的确经历了孙正聿教授所指认的“教科书改革时代”与“后教科书时代”。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哲学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摇篮。除了著名的“艾本”以外，改革开放之初出版的“肖本”、“李本”、“陈本”等等都是“教科书改革时代”的标志性成果。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时正处在这一时期的巅峰年代。“教科书改革时代”有两个基本命题，也同时构成了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其一是“哲学内容的时代化”，特别强调哲学与时代、时代精神的内在关联，恢复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活的灵魂”的本真意义，努力颠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僵化理解，以反思时代本性、解答时代问题的方式来推动哲学形态的变革，提出了“改革的哲学”与“哲学的改

革”、“哲学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哲学”关系的研究，这一充满时代气息与创造活力的哲学变革包含着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对我影响至深。1988年，我主编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悄悄的革命——主体、文化、价值的变革》，就是在大变革的时代以文化激进主义立场重新勾画哲学图景的尝试；其二就是“表达方式的教科书化”，这无疑是“路径依赖”的产物。长期以来，教科书成为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话语形态，研究成果能否进入教科书、能否将创新成果以教科书方式表达和表现，一直成为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中心的全国各大学关注的焦点。所以围绕教科书改革，全国成立了几个重大课题组，召开了若干次学术会议，但终因学者们的见解已出现多元化倾向而难以统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分歧再也无法用一种统一的教科书话语体系来实现形态变革与创新的初衷。于是，“教科书改革时代”就被“后教科书时代”所取代。这一时代转换了研究范式，也有两个标志：其一是出场路径的变革，不再以统一的教科书，而是以自己的学术专著来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其二是出场形态的变革，不再追求大一统的体系理解，而是深入地探索过去被忽视或未开垦的领域如“价值哲学”、“发展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管理哲学”等等，被称之为“小体系时代”。尽管分门别类的研究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更贴近了生活世界，丰富了理论家族，但依然无法回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形态。因此，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我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新理解。

欣：回顾历史让我们倍感亲切。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哲学变革一直成为改革开放的精神表征和理论先导。在思想解放的年代，理论创新是大家颇感兴趣的话题。那么，您为什么将“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变革的理论方案？

任：在1999年出版的《交往实践与主体际》一书中，我曾经说过，提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主要根据有三：第一，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主体际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哥德巴赫猜想”，非交往实践观难以解析。启蒙运动以来，“主体性哲学”、“主体—客体”模式一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开始，20世纪掀起的“实践哲学”转向，使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包括科学主义、人

本主义、实用主义等)都成为以实践、行动、生活世界为底板的哲学。然而,在全球化的催生下,一个问题也因此困扰着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解释学到后现代哲学:主体际。全球化不断使“我”遭遇“他者”,在异质性、差异性主体之间需要建立交往与对话关系。于是,“问题中的哲学”就变成了“哲学中的问题”,成为古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之谜”当代版:在逻辑上,“大写的”、“第一人称”哲学、作为主体的“我”似乎始终只能面对对象客体,我们何以可能面对另一个作为主体的“他者”?解答方式在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的现象学中是绝望的,而莱维纳斯只给出一个永恒存在、绝对不可消解的“他者”,伽达默尔强调“视域融合”和“效果史”,而阿佩尔与哈贝马斯的主体际交往行动理论没有论证,而是直接给予。其实问题的解答并不复杂。在我看来,交往实践是一个“主体—客体—主体”的三式结构。其中每一个主体都直接面对中介客体,因而多元主体可以对峙而立,使之在逻辑上成为可能。第二,与主张“主体—客体”两极模式的现代哲学及崇尚“差异化”、“多元化”和主体际哲学的后现代哲学对话,非交往实践观不能超越。“交往实践”的三式结构一方面吸取了现代哲学(主体—客体)与后现代哲学“差异性多元主体”或主体际关系结构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又扬弃了两者的缺陷:现代哲学的单一主体性与后现代哲学无客体底板的多元主体,成为超越两者的新理解。第三,融会中哲、西哲、马哲而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当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人伦哲学向度早在中国先秦哲学的儒、道、法、兵等诸子百家哲学思想中就大量存在,挖掘这些思想,成为我们今天学术界的一个重任。当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物质交往”成为他们构建新世界观的一个核心概念,需要我们承接这些思想遗产。今天,“主体际”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轴心话题,表明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因此可以成为融会中、西、马,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欣:交往实践观在超越了“单一主体性”模式的同时是否消解了个体主体性?此外,交往实践观与您曾经提出的“公共哲学”有何关系?

任:超越单一主体性绝不是消解个体主体性,相反,是更科学地解释了个体主体性存在的合理根据。正如我在1999年发表于《江海学

刊》、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文章中指出的：交往实践观也是通向公共哲学的必要起点。在交往实践观看来，虽然个体与公共的是对应的两极，但它们都是交往实践对应生成的产物。关键是要追问与理解它们对应生成的合理机制。交往实践具有双向建构、双重整合的功能。所有双向建构，就是一方面建构主体形态系列（包括个体与群体），另一方面建构交往关系系列。交往主体与交往关系是对应生成的。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不是“人本学”的，因为主体之为主体是一种交往实践的身份和人格化，不是先验的定在，而是由交往活动后天造就的。人在什么层次、以什么方式介入何种交往实践，人就成为怎样的主体。因此，在其现实性上，人的主体性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交往实践甚至也不是结构主义意义上的“唯社会关系论”，因为根本不存在先验存在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关系。任何社会关系，包括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与主体性一样，都是被交往实践双向建构的产物。所谓双重整合，指交往实践对应地生成双重主体形态：一方面整合为个体主体；另一方面整合为群体主体或公共主体。两者呈现差异性、异质性的存在，但同时又是被交往实践共同造就的。因此，交往实践观并没有消解个体主体性，相反，在异质性意义上，只有交往实践才能造就个体主体。交往实践也是通向公共领域、公共哲学的起点，因为整个公共领域也是交往实践的产物。

欣：您能否进一步谈谈探索这一理论方案的大致过程？此外，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日本学者广松涉的“事的世界观”等越来越多的译介与研究，人们也想知道：究竟您的观点与上述理论有何差异？

任：在不同语境中出现对交往实践与主体际问题的共同关注，这本身就表明这一问题具有时代性。我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酝酿、核心概念、形态建构。可以说，我提出交往实践观有三个思想资源：20世纪80年代初，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物质交往”思想的研究；90年代初与后现代哲学的对话。“交往实践观”核心概念的构建，当然需要深入思索与哈贝马斯的主体际交往行动理论的关系。在我看来，根本差别在于以下两点：第一，从“普遍语用学”出发，哈贝马斯将交往主要看作是一种“为达成相互理解的话语行

动”，因而是精神交往与话语行为；而遵循马克思“物质交往”的思绪，我认为交往实践是发生于多元主体间为了共同改造中介客体的物质活动。在马克思看来，精神与话语交往不过是物质交往的产物，是更加“遥远的形式”。因此，我用“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来表明与哈贝马斯的哲学差别。第二，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先验地设定判定交往合理化的基本原则，而我的观念正相反：任何交往原则，都不过是交往行动本身的积淀，是后天的产物。在这一意义上，两者存在着根本不同的路向。至于以交往实践观来超越后现代哲学，我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最初选择以认识论作为对话的切入点，1992年出版了《广义认识论原理》。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后现代哲学家罗蒂等人在反对传统哲学以“主体—客体”两极模式作为“自然之镜”的幻象的同时就主张主体际对话与民主，进而主张消解认识论。因此，如何将主体际关系纳入认识论，进而改造认识论而不是消解认识论，就成为我与后现代哲学对话的焦点。第二个阶段以交往实践观打开社会存在大门，在社会生活世界的更广泛领域与后现代哲学展开对话，这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及《交往实践与主体际》一书为主要标志。至于“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广松涉“事的世界观”的差别，我在2007年赴日本参加第三届广松涉哲学思想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就阐明了基本差别。在理解马克思世界观本真的意义上，我们共同强调主体际交往关系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之间的基本差别在于：他将交往关系看作最终结的本底，而我认为应当是交往实践活动，关系不过是活动的产物。如果强调关系结构的本原性，难以摆脱结构主义的纠缠。

欣：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确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理论视域，这一理论不仅在哲学界，而且在政治学、文化学、传播学、翻译学、教育学等领域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那么，我的一个疑问是：在这一理论产生重大学术影响的时候，为什么您近年来突然转向“出场学研究”？

任：的确，提出“出场学研究”是我学术道路的一次转折。学术领域是一种公共空间，开拓者未必需要原地固守，“待到山花烂漫时”未必在“丛中笑”。既然学术是一条思想之路，那么任何思想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路标。继续前行的触发点是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

“方法论自觉”的反思。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构建到更加注重背后的方法论探索、研究范式的批判，这是一次思想的深化。构建形态固然重要，但是对构建的原初语境和方法论考察更具有前提批判的性质。诚如黑格尔所言，方法之在内容中的贯穿便是体系，或曰形态。哲学是以头脑与世界相联系的，而形态则成为一种哲学与世界联系的样式。旧哲学痴迷于形而上学体系，一百次、一千次地醉心于构建体系或形态，但终因根据的虚假而不能挽回被解构的命运。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不仅表现为体系形态上，更表现为研究范式上。破除这一僵化体系，如果没有理论的前提批判与范式转换，那么如何保证新的形态构建不是一种更加谬误的话语想象？因此，从直接的形态建构转向建构形态根据的探索，应当是一次从结果形态向前提批判回溯的思维运动，是更为深刻的追问。按照库恩的见解，“范式”就是一种视野、规范、规则和方法论，它是一种见解、观点和理论的根基与灵魂。相对于理论结论或见解的变革而言，范式的变革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变革。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可以带动整个理论视域、理论形态的变革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进程就内在地包括了范式变革的历史，出场学视域就是这一系列变革的必然结果。

欣：那么，您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问题？出场学与之有何关联？

任：我认为，出场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创新的必然结果。当代中国学界提出的教科书改革、文本学—文献学研究、与中西方思想的对话、问题的反思等等，都成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毫无疑问，这些范式在多方面深刻破除了苏联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的理解方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化与发展。但是，客观地评价这些研究范式，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某种缺陷，没有达到“与时俱进”研究范式应有的高度。

例如，究竟如何重新考量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出场路径？在这里，出现了两种对立性的思考。一是提出“回到马克思”，认为苏联教科书的僵化教条思维对马克思的原初语境的严重遮蔽，需要中国学者自己“上手”回到当年马克思原初语境去“廓清地平”，在对文本进行重新解读的基础上达到重新理解。相反，对立的意见则强调“马克思仍然是我

们的同时代人”、应当“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认为解释学意义上的原初语境已经无法判定，而当代的理解是为了当代的实践。因此，应当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研究。^① 弥合对“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两种对立性见解，需要以时代实践为历史语境，坚持“与时俱进”地加以统一理解。因为马克思的文本—思想形态对出场语境与出场路径具有深度的依赖性，因而是历史的出场形态。要科学深刻地理解马克思思想形态，必须要穿越文本，深入背后去把握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文本形态的关联。此外，虽然对话是打磨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锋的砺石，但是，对话需要历史的底板、时代的基础和实践的尺度。否则，对话就失去了时代真理的标准。从历史实践这一语境出发去理解对话和评判对话，建立与时俱进的理解范式，这就是重新呼唤出场学研究，因此，中国当代研究范式的创新必然走向出场学视域。

欣：您是说对“时代问题的反思”造就了出场学视域，历史变迁与出场学具有内在的关联。那么，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出场学又怎样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任：出场学视域就是在总体上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内在地召唤出场学视域。把在一个时代语境中形成的理论形态僵化为“永恒在场”的“终结真理”，这是一切旧形而上学的根本幻想。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②，要求理论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重新选择出场路径与方式，与时俱进地创造新的在场形态。“与时俱进”贯穿着一种出场学视域，它将人们对“原版”或者“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义、思想形态的追问转换为一个“出场学问题”：任何马克思思想形态都不是现成在场、永恒不变的。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作为问答逻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不仅要考量“原版”或“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形

^① 俞吾金：《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载《文汇报》，2000-08-02。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态，更要追问马克思思想出场形态背后的历史语境，将出场形态看作出场语境的时代性结果。因此，出场学研究着眼于把握两条基本线索、四大模块：第一条线索，即从马克思思想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变化分析入手。它包括：什么曾经构成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原初语境”？什么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新语境？从历史语境到当代语境，其间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具有怎样的“历史间距”？进而这一差异对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对此，我们已经看到：历史语境的变化构成两大模块：作为“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周围感性世界”的资本全球化，以及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新全球化时代。^① 第二条线索，就是从“当年”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视域、形态、思想、理论的变化。两者之间出现“历史的间距”，就是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出场视域上的变化。“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构成的两大模块，与历史语境变化的两大模块相互对应性，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学视域。正是在这一经纬线上，无论是“原版马克思”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都不应当被重新僵化地理解。因而，“回到”与“走入”就在“与时俱进”基础上达到视域融合和统一。因此，我提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旨在探索在差异化时空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如何不断地选择自己恰当的出场路径、出场方式和出场形态，进而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

欣：“出场”是舞台艺术表演中的一个常用词。那么，您用这一词表达的哲学含义是什么呢？

任：读者可能对“出场”一词既熟悉又陌生。“出场”一词源于“舞台”表演艺术。但是这一舞台不是一般剧院的台场，而是人类历史的宏大舞台。相对于这一舞台，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历史选择何种思想与行动为主角出场来主演人类历史剧，是至关重要的。“出场”与“退场”对应，也不等于“在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60年前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宣告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出场；70年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社会主义成为制度性在场。然而，

^① 参见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16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又70年后，苏东剧变使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退场”。西方的“神圣同盟”当然极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舞台出场和在场的可能性，祈望彻底埋葬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甚至话语权，让马克思主义永远“退场”和“缺场”，这不过是一种“幽灵的梦幻”。“出场”也不同于“在场”。一切教条主义则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现成在场形态”，一劳永逸的僵化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所谓“在场的形而上学”，从来就坚决反对将思想变成教条。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空间语境转换而不断重新出场的。出场是对现成在场状态的超越，永远是与时俱进地创新，永远是对出场路径、出场方式与出场形态的时代选择。

欣：拜读您在2004年第10期的《哲学研究》上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路径”一文，那么，什么是您说的“出场方式”与“出场路径”？

任：马克思主义从当年到当代出场方式的转换，我们需要深度思考其中的三个关键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对马克思主义出场语境——历史地平线转换的思考。伽达默尔曾经说过：“处境这一概念的特征正在于：……我们总是处于这种处境中，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某个处境里，因而要想阐明这种处境”^①，尽管这一阐明是不可能彻底完成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出场语境的追问应当包括下列问题：什么曾经构成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或“原初语境”？什么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新语境？从历史语境到当代语境，其间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具有怎样的“历史间距”？这一差异对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出场语境不仅是文本意义的结构，而且首先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所构成的历史结构或历史时代——马克思思想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因此，对出场语境的分析，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出场条件的考察，对从当年到当代历史条件演变的分析。

第二个环节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对于出场路径有深度的依存性。任何文本的意义、理论表现方式、存在形态其实都是一种依赖于出场路径的出场形态。文本意义、文本理论形态实

^① [德]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38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实际上只不过是出场形态，是受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决定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发生时代变迁，那么就应当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场形态。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创新格局。所谓“一体”，就是对重大时代问题的实践反思，这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路径。所谓“两翼”，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及与各种时代思潮的对话。“一体”就是“改变世界”的实践路径。如果说，当年马克思“改变世界”主要在于摧毁一个旧世界，那么今天更需要在中国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不断创造出“中国经验”，进而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第三个环节是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我们需要确立的出场学观念是：马克思文本意义、文本形态、理论形态是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的理论表现。无论我们追问马克思思想的以往形态或者当代形态，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的语境。文本的意义结构只是那一语境、路径中的相对历史形态，而绝不是无条件、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对文本意义结构的理解，也不能舍弃语境和路径来孤立地加以研究。随着语境和路径的历史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就会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出场形态。

欣：感谢您的细心解释。最近看到您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文章，以及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丛书》，我有一个深刻印象：似乎您领导的苏州大学学术团队正在围绕这一研究范式来开展工作。那么，您是否可以谈一谈未来的研究设想？

任：好的。出场学的理论旨趣在于促使哲学走向实践、走向生活、走向历史、走向差异，是反文本中心论、反僵化教条的研究纲领。纲领内在地包括着“出场学循环”：哲学的生命力并非指它能够永恒同一地在场，而是要通过“不断出场”才能“秉持在场”；但是，每一次的出场又总是遭遇时空语境的变化，因此造成出场的差异性。出场与在场的循环，同一与差异的循环，永无休止。“普遍在场”或“永恒在场”的可能性不过是不断出场的持续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需要在历史的和地域的差异境遇中不断出场，因而造就了新的出场形态。遵循这一思路，我领衔的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

进研究：其一，进一步凸显“改变世界”的理论品格，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当代语境和中国语境的研究。“我们的时代”是当代哲学赖以安身立命的历史基础；对当代中国重大实践问题的哲学反思，特别注重对中国本土发展哲学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安身立命之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题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改变世界”实践的“第一要务”，因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出场的当代语境。发展也因此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一种哲学如果强调走向“生活世界”、走向实践、走向人的生存，在今天就不可能不与发展实践这一中心相关联。正是发展凝聚着全体中国人对改善生存状况、走向美好生活的愿景，荷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也因此成为“发展哲学”辉煌出场的历史舞台。其二，更加凸显出场学视域的创新价值。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曾提出评判“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的三条标准：能够吸纳旧纲领中一切不受反驳的成分；能够合理地解释旧纲领难以解释的反常事实；能够更有效地预见新的事实。我想出场学也应当具备这些特点。出场学并不是简单消解其他研究范式，恰好相反，她强调其他研究范式的合理价值，但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化和推进，能够在出场语境、路径的变化中来把握文本意义、展开对话、构建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出场学才能成为一种具有中国原创风格的研究范式。

目 录



上篇 反思的问题学与哲学革命的当代路向

马克思主义“反思的问题学”及其当代意义 / 3

1. “反思的问题学”：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层指向/3
2. 新全球化时代“反思的问题学”：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方式/7

资本全球化与马克思 / 11

1. 资本全球化：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12
2. 对资本全球化的批判反思：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视界/18
3. 资本全球化与交往实践观：双重视野融合/21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 / 24

1. 三次历史遮蔽：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缺场/25
2. 核心与形态：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反思/28
3. 马克思之后的现代性：一种历史探索/31
4. 在中国新现代性建构语境中重新打开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视域/33

马克思哲学革命出场的现代性路径 / 36

1. 马克思哲学革命发生的两大基本语境/37